

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

〔日〕 濑川昌久 著 钱杭 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





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

〔日〕濑川昌久

钱 杭 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

族谱： 华南汉族的宗教·风水·移居

著者 ☐ (日) 濑川昌久
译者 ☐ 钱 杭
封面设计 ☐ 程 钢
出版 ☐ 上海书店出版社 (福州路 424 号)
发行 ☐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 850×1168mm 1/32
印张 ☐ 9.875
字数 ☐ 226 千
印数 ☐ 0001-3000
出版日期 ☐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印刷
书 号 ☐ ISBN 7-80622-607-9 / K·108
定 价 ☐ 22.00 元

中译本序

日本在以往的历史中学自中国的东西,保留下来的不计其数,从汉字和以汉字书写的古典文献,一直到建筑技术和食品。但是,有一些东西却始终没有在这一过程中被日本所接受,这就是科举制度、宦官制度,还有真正意义上的父系继嗣制度。

日本人也非常重视对于祖先的祭祀,和对于祖先系谱的追溯;在所谓的名门望族中,保存有书写完整的系图也并非罕见,然而却没有形成如同中国宗族那样的基于严密的父系原则之上的亲族集团。至少在德川时代以后的日本社会中,由女系的子孙继承家庭的成员权和姓氏的现象,并未被看作是对社会规范的某种背离,而且事实上还被人们频繁地实行着。不但如此,把全无血缘关系的人收为养子,使之继承家族世系的做法也得到普遍的承认。这就说明,在日本,家族成员资格的继承并没有受到父系亲族关系的约束。

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中的日本人,在观察中国的父系制度时,就会发现其秩序的森严和对于原则的坚定贯彻。记得笔者当年在香港新界进行田野考察中,看到宗族村落时,确实就有过类似的感慨。那些对供奉着父系共同始祖的祠堂和坟墓的祭祀,以及子孙们以“房”为单位分居于一个单姓村落中的情形,完全就是父系原理的形象化再现。当时,我每走访一个村落,就会禁不住因

满足了求知欲而有一种难以比喻的兴奋。

不过,对于宗族这一中国式父系集团来说,可以被称之为“宪章”的,则是它们的族谱。在某种意义上,族谱是分析宗族的活动以及隐藏其背后的父系理念和历史意识的最理想的资料。因此,笔者就制订了一个计划,准备以香港新界考察时所获族谱为基本素材,来分析研究中国的族谱及相关问题。虽然解读和分析族谱花费了几年的时间,但由于直接读到了正史中未曾提及的民众的历史,因而极感振奋。所获成果亦终于在1996年秋得到了出版的机会。

1997年5月,即在本书出版后半年左右,我接受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应聘任教于日本金泽大学文学部的钱杭博士的访问,他向我提出,希望能将本书用中文翻译出版。我知道钱杭博士已出版了《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91)、《中国宗族制度新探》(香港中华书局,1994)、《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等著作,是在宗族研究领域内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新一代学者。拙著能够得到象他这样的专家的关注,对于笔者来说自然高兴异常;特别是得知钱杭博士有意亲自担负中译之劳,更是感到荣幸之至,因而立刻承诺了关于翻译出版的授权委托。

不仅如此,通过对拙著的这次翻译,我能够结识钱杭博士,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对我个人来说,都是一件极为幸运的事。翻译过程中,我得到了他许多宝贵的指点;关于对今后新的研究的展望,也有颇多有益的启示。在仙台和金泽,我有机会与钱先生全家一起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另外,我看了钱先生交给我的拙著中文译稿,可说是极为忠实地传达了笔者原著的文意,即使是一些非常细微之处也得到了毫无差错的准确翻译,对于钱杭博士真挚的

努力,我深表钦佩。在这里我要再次向我的朋友钱杭博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承蒙钱杭博士的盛情和努力,本书被译为中文,有了与中国读者见面的机会,对此笔者感到由衷的喜悦。如果还能藉此机会获得广大中国读者坦率的批评和建议,作为作者,我更会感到无比的高兴。

作者

1997 年 11 月末

于仙台

译 序

1997年初,当我在日本国立金泽大学文学部担任特聘教授期间,田仲一成教授向我推荐了一部1996年10月出版的新著《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作者是国立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濑川昌久。一读之下,欣喜莫名,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立刻决定全文译。经濑川昌久教授和东京风响出版社的授权,现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中译本,郑重介绍给正密切关注着这一研究领域最新进展的中国学术界同人。

这部著作以作者历时多年亲自收集的香港新界三十种族谱为资料,综合运用各种方法(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文献学等),系统分析了自宋、元、明、清以来,在包括香港新界在内的整个中国华南地区,以汉族为主体的地域社会和地域文化的形成、演变及其特征;在中国宗族制度史、区域移民史和区域文化史的研究上展示了许多新的观察角度,提出了许多新的解释,也进一步发现了不少新的问题。据我所知,在目前日本汉学界同类学科中,能够具备本书所达到的学术水准的著作,似乎并不很多。

关于本书在理论上和学术上所作的具体贡献,读者可以参阅附录中拙作“解说”,在这里我只想指出本书两个最基本的特点。

第一,本书的资料积累始于1983年。当时,作者作为东京大

学著名文化人类学家中根千枝教授的研究生,为研究中国汉族的社会组织,广泛地考察了香港新界、广东、福建和海南地区;特别是在香港新界,前后住了两年之久。他顶着南国的烈日,操着一口流利的粤语,访村问舍,走遍了新界各个或古老、或年轻的聚落,收集了大量第一手的文献、实物和音像资料。与众不同的是,回到日本后,他没有匆忙地将考察结果草草地公诸于世,而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冷却、思索、整理和反复的研读,才于1990年前后开始陆续发表相关的论文;而最终完成本书的时间,更是迟至进行初次调查的十三年以后。对一个学术专题这般耐心,这般沉着,这般谨慎,令人很难相信是一位至今刚满40周岁的年轻学者之所为。有此稳重扎实的耕耘,必定会有丰硕长久的收获。这是完全可以预想得到的。在这里,我不禁联想到,被誉为中国宗族问题研究泰斗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莫里斯·弗利德曼(Maurice Freedman)所提出的一系列“中国宗族模型”,之所以会过早地受到学术界普遍的质疑,原因当然很多,但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因为弗利德曼的中国宗族研究,实际上是建筑在参观式的实地考察、“坐在安乐椅上”的研究策略和转引他人著作的取材方式等基础上的。比如,由于健康上的原因,弗利德曼在香港地区的整个田野工作总共不过短短的三个月;他基本上不能阅读中文,其代表作如《东南部中国的宗族组织》(1958)、《中国的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1966)所使用的中国资料,主要来源于胡先晋、张仲礼、林耀华、杨庆昆、费孝通、刘兴唐、刘夫人、何炳棣、陈达等中国学者的英文著作,或其他英、美、法学者和传教士的研究报告,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局限。当然,弗利德曼的著作至今还是本学科的必读书目,其建构的模型和基本原理肯定是一座不容轻易绕过的里程碑,但这一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弗利德曼的天才。我们知道,天才大概是无法学的。作

为资质平平的普通学者,我们更珍视的是可以取法取譬的榜样。濑川昌久这部著作成书过程之特殊,就是它值得译介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据作者自述,他以前“始终只是把族谱当做一种田野资料的旁证材料,或是关于村落、宗族以往历史的辅助性资料来看待”(本书原序,下同)。这当然并不能算错,族谱作为一种私家性质的记录,本不以公诸于世为目标,它在历史研究中的旁证和辅助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但问题是,如果将族谱的价值和意义仅仅归结于这两点,显然说明还未真正触摸到族谱的“本体”。在获得这些族谱的十年之后,作者才“惊异地发现”,原来早已到手、并反复读过若干遍的这一大堆族谱中“被反复描绘的人们历史的深度,以及由此而反映出的真实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竟被自己忽略了;“族谱编纂者的意识结构,以及存在于他们背后的社会性与文化性规范”,也被“一味纠缠于族谱的真实性”而取代了。认识到这一点真是一次巨大的飞跃,因为只有“在这样一种眼光的观照下,族谱才成为无价之宝”。十年面壁,终于一朝顿悟。从此,他就从文本表层所描绘的现象世界,进入到文本深层所内含的意义结构。一个外国学者能以如此厚重的历史感来解读中国的族谱,真应该引为我们难得的知音了。然而说来令人惶惑,在一部分中国社会史研究者心目中,族谱对于今天的研究是否真有价值居然还是一个大可讨论的问题。白云苍狗,见仁见智,本存乎一心,无可厚非;而学术襟怀差距之大,却不免令人默然。据我看来,濑川昌久的这部著作至少能够使我们了解到,对族谱还可以有这样一种读法;并且这种读法无疑将在国际学术界处于领先地位。

我与濑川昌久教授不仅是同龄人,而且一见如故,性格情趣也颇为投缘。5月间初会于太平洋畔的仙台,11月末又重逢于日本

海边的金泽,谈学问,谈经历,谈家庭,谈种菜,一杯啤酒、几盏清茶,相得甚欢。以后因斟酌译文,核对出处,电话传真、网路邮件频繁往来,更是增进了友谊和了解。值此中译本出版之际,我一是向他祝贺,从此他将成为一个拥有大量中国读者的真正的汉学家;二是对他感谢,如果没有他的支持和配合,这部中译本断无可能如此迅速圆满地完成。

本书正文和注释的翻译,均按照严格直译的原则进行,译文亦经作者亲自审定。对一些重要的学术背景资料,特别是对由弗利德曼所建构的中国宗族研究模型,由于正文在评论和引用时省略了必要的介绍,这对未曾系统接触弗利德曼原著的读者来说显然不大方便。因此,我就在各章节的内容论述中,随文用译注的形式对一些我认为应该加以说明的概念术语、学术背景和弗利德曼的论证过程,进行简要的介绍与解释,供读者参考。

在大多数日译世界学术著作中,都会附有一篇专业性很强的“解说”,目的是或全面、或有重点地论述和评价该书的学术价值。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比译序和书评都更自由、及时,并使写作者具有充分发挥余地的很好的形式,值得借鉴。这一设想得到了本书中译本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的认同,因此,我另行写作了“解说”收入本书的附录之中,作为译者对所译文本的一个理解呈献给读者,并诚恳地欢迎读者的批评。

译者

1997年12月

于日本

原 序

1

自 1983 年以来,笔者一直以汉族的社会组织为主要研究课题,对香港新界及中国本土的广东、福建、海南等省,进行实地的调查和研究。其中最长的一段为期两年的田野工作(fieldwork),是在香港新界地区进行的。这次调查使我获得了一个机会,能够对当地那些源自明清时代的村落中的村落组织和宗族组织作一详尽的分析。这是一次以社会人类学中所谓“共时性分析”框架为原则的研究,其研究的目标,是根据对现时人们活动内容的观察,和对他们作为报道人所称述的关于过去的见闻的记录,来分析村落组织、宗族组织以及方言集团自我认同(identity)的现状,并将结果加以模型化。

然而,对于汉族社会这样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和拥有文字记录的社会来说,单纯的仪礼观察和口头传承记录,毫无疑问是不能用来作为接近他们的生活和生存世界真相的手段的。在那里存在着各种形式的文字资料。在田野工作中遇见率很高的“族谱”,就是这些文字资料中的一种。由于族谱的内容可以使研究者据以探悉汉人社会生活的实际状态,因而极具利用价值。笔者在进行实地考察的同时,就曾经在村落里及当地的大学图书馆中,广泛地收集了这一类族谱的副本。

不过在开始的时候,对于这些族谱究竟在实际的分析研究过 2

程中能成为何种性质的材料,笔者并没有明确的观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始终只是把族谱当做一种田野资料的旁证材料,或是关于村落、宗族以往历史的辅助性资料来看待。因此,即使在参考使用族谱的时候,其阅读的方法,也不是系统地通读整部族谱,而仅仅是选读某些特定的人物传记和特定的事件记录而已。

大约在最初的田野工作过去十年以后,因为担心当时在考察现场复制的族谱出现损坏,就决定用扫描器把它们摄制成缩微胶卷,以便长期保存。从这时起,我才开始比较正式地对以往所收集到的族谱,从各个方面作进一步的研讨。其结果,惊异地发现了族谱中反复描绘的人们历史的深度,以及由此而反映出的真实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族谱作为一种历史资料,如果被深藏在资料柜的角落里,那确实太令人惋惜了。

自那以后,笔者一直尝试着以这些族谱为主要资料,分析其中所涉及的汉族社会的各个方面,本书就是将以上研究工作汇聚而成的一个成果。笔者的目的,是希望将香港新界地区各宗族的族谱作为主要的分析材料,通过这一媒体,看一看从族谱中究竟能够对华南汉族社会的各个侧面作出何种程度的解释。

当然,由于和田野调查中所获之口头传承资料及观察资料相配合,这类族谱资料就成为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文献,其中有很多或许就可以因此而获得初步的理解。事实上,在本书所进行的分析中,也始终将得自实地调查的知识作为必不可少的前提。然而就整体而言,本书的目的,仍是尽可能根据族谱本身所记载的内容,来探明体现在族谱视野中的那一个世界。

不言而喻,族谱的记载并不都是事实;同时,对这类族谱进行客观的考证,然后在真实的基础上重建其历史,也不是本书的主旨。笔者认为,充分地保留对于族谱记载内容真伪程度的判定,而

将其内容重新理解为带引号的“事实”，并力图去解明记录了这些族谱的编纂者的意识结构，以及存在于他们背后的社会性与文化性规范，这比一味纠缠族谱的真实性要有意得多。而且正是在这样一种眼光的观照下，族谱才成为无价之宝：它可以极其生动地告诉我们，隐藏在宗族、祖先祭祀以及这些活动背后的父系世系理念、对于父祖之地的认同，等等。

本书各章的内容如下。第一章，从讨论族谱的编纂过程入手，试图说明与族谱的虚构性并存而隐藏其背后的历史意识。第二章，以族谱为主要证据，分析香港新界各宗族的移居史以及地域社会形成的过程。第三章，主要根据上述地区一些大型宗族的族谱，来说明各宗族间的联合与纽带关系。第四章，通过分析族谱中与墓地风水有关的记录，探索宗族参与墓地风水事务的具体方式。第五章，主要根据本地系邓氏的实例，讨论宗族的形成发展与对风水事务的参与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哪些有意义的关联。第六章，通过对客家宗族族谱的分析，考察记载了他们移居故事的宁化石壁传说的真伪性，及其出现的背景。第七章，根据与华南地区其他族群(ethnic group)的传说进行比较的观点，来重新考察客家的移居传说，并进一步讨论华南地区族群的族源(ethnicity)*变化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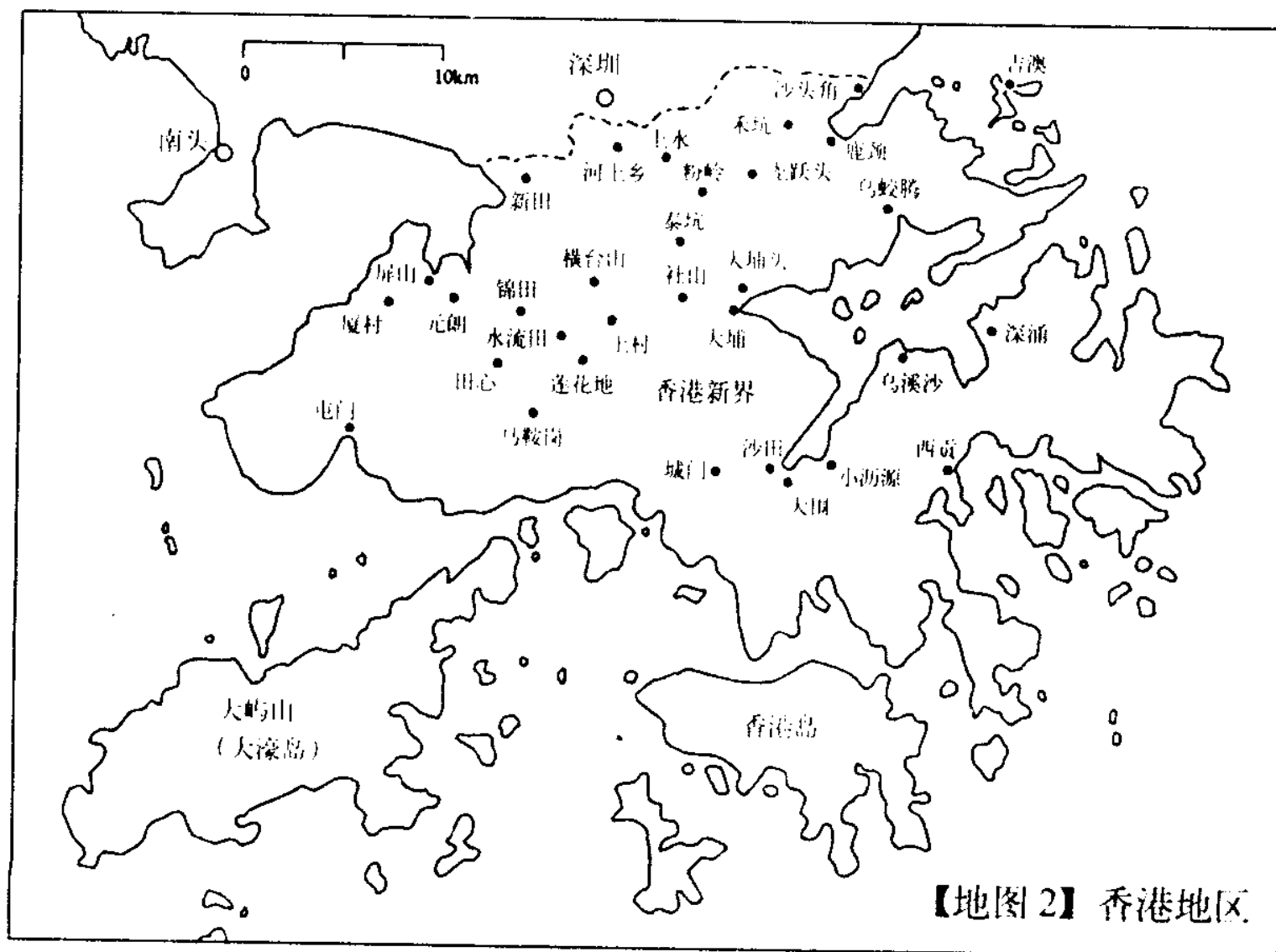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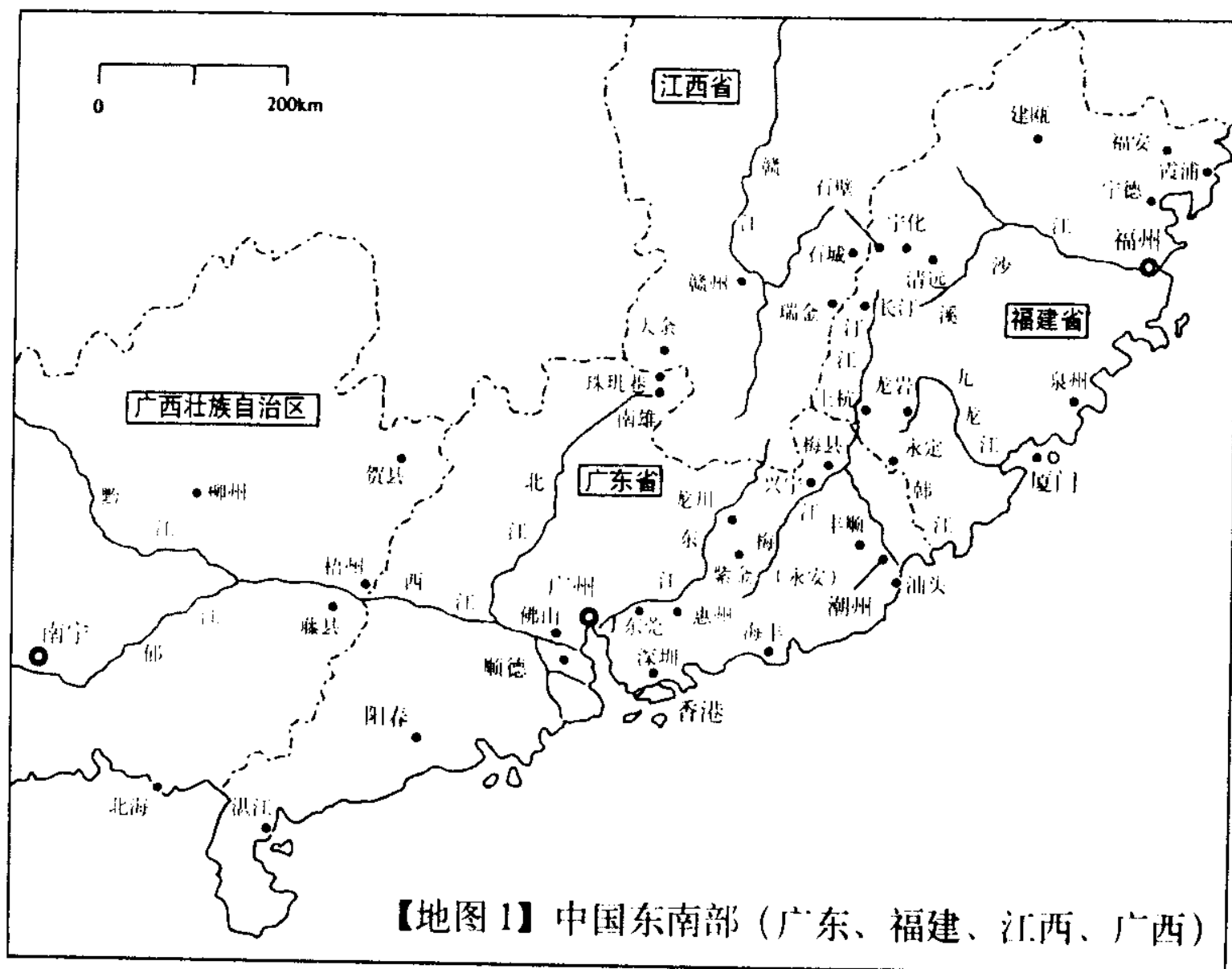
关于本书所利用的族谱资料的名称、概要和获得途径，书末已列表加以说明。正文中提及时，同时附记列表之中的号码，以供读

* ethnicity 一词，原著作为日语外来语用片假名音译。考虑到本书论述的具体内容，濑川昌久教授同意中文译者的处理，将之意译为“族源”，但认为应加以必要的说明。以下是作者 1998 年 1 月 15 日的补充说明：“英文 ethnicity 一词的语义较复杂，日文、中文都没有直接的对译语。在这里使用‘族源’还是比较合适的，但应作一些说明。该术语的原意是指某一民族的特性、特质，或其来历和起源，但在文化人类学上，它更多地被用来描述概括性的、因民族差异的存在而产生的诸现象之总体。”

〔按：凡正文中所加脚注，均为译者注。〕

者在必要时加以参照。另外,文中的注音,主要是针对香港新界地区的粤语地名,并以各章初次出现为加注原则。但对族谱中作为资料用语使用的地名和人名,则一概不加注音。* 关于文中所涉及的主要地名,请参照目录之后的【地图 1】与【地图 2】。

* 原著中以日语片假名为部分香港新界地名注音,主要是为了方便日本读者,而中国读者一般无此需要。征得濑川昌久教授的同意,中译本省略了这部分内容。



目 录

中译本序	1
译 序	5
原 序	9
第一章 族谱与历史意识	
一、引言	1
二、族谱的编纂——一个追溯性的过程	4
三、对接近编纂者世代的记载	7
四、对与开基祖相关的分支始祖的记载	12
五、对开基祖以前的远祖系谱的记载	16
六、结语	21
第二章 移居与地域社会的形成	
一、引言	26
二、见于族谱的人们的移动性——新界原住民祖先的 移居	31
三、移居与地域社会的形成(一)——明末以前	39
四、移居与地域社会的形成(二)——清代初期至中期	46
五、从国内移居到海外移民	55
六、结语	63